

■ 玉林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博士科研启动基金）
“《野草》与《烛虚》比较研究”（G2021SK18）成果

《野草》与《烛虚》 比较研究

陈彩林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野草》与《烛虚》比较研究 / 陈彩林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2.8
ISBN 978-7-5643-8879-9

I. ①野… II. ①陈… III. ①《野草》-诗歌研究②
散文-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10.97
②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157032 号

《Yecao》yu 《Zhuxu》 Bijiao Yanjiu

《野草》与《烛虚》比较研究

陈彩林 著

责任编辑	居碧娟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26.5
字 数	353 千
版 次	202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8879-9
定 价	7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面对人类世界的总体性现代转型，近现代以来深处救亡图存危机的中华民族该如何重构崭新的生命本体以振疲起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为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于此担负着重要使命。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也就意味着文学对于生命守望的顶层体现于其哲学维度。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中国现代文学于此做出了怎样的探求，达到了怎样的哲学高度？这正是本书研究针对的问题。为此，研究者在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基础上选择了一个具体的切入点：《野草》与《烛虚》比较研究。通读这部三十余万字的著作，真切感受到研究者凿壁穿隧的用力，干净周致的比较研究让问题逐渐敞亮开来，向人展示出如下学术图景。

鲁迅以“立人”为其文学创作的贯穿性支点，沈从文以“重造生命”为其文学创作的贯穿性支点，正是各自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彻把握。自从鲁迅痛感“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时候起，发露民族的劣根，重构善美刚健的民族生命本体，便成为他终生一以贯之的生命实践。生命应该有个怎样合理的安排是沈从文一生不懈的探求，他要在“一切经典所建

议的抽象原则，已失去其应有尊严作用，而显得腐霉败坏时”重造经典，以此筑造供奉“人性”的神庙，重构“生命”信仰。正是立足历史转折处“归一”于民族生命本体的现代重构，二者才以各自殊异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存在。

痛感近现代民族生存危机，以五四为契机，鲁迅首先以传统主流文化中心区域生存方式的缩影——“鲁镇”为基点来观照民族现实生存。《呐喊》《彷徨》借狂人之口道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民族生存史。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所思考的是为什么在这部民族生存史之中这些“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被吃者也会去“吃人”。也就是说，吃人者与被吃者除去外在社会结构上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之外，二者在人之本体根性上并无差异，这正是《狂人日记》等作品揭示的民族“四千年吃人履历”的历史同一性根源。在以时间性的纵向历史眼光对整个民族生存史进行回溯中，鲁迅以专制主义与人的存在这一人类生存从古到今所面临的痼疾为视角，发露出维系这一社会历史结构的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表现形式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仁义道德”之下的“吃人”面目，呈现出奴隶时代循环的历史同一性，进而揭示出最根柢的“中国问题”，即“人丧其我”“本根剥尽”。

“鲁镇世界”正是本根“无我”的民族生存范本，这里的“我”实质是人之为人尊严、独立、个性、自由的“自性”。《阿Q正传》最具代表性的原因正在于此，阿Q实则是鲁迅于本根无我的民族生存史中以“鲁镇世界”为范本提炼出的典型文学形象，“精神胜利法”凸显出民族善美刚健生命本体的缺

失。他的创作是“中华民族中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中心区域的生存方式最集中、最深刻、最典型的显示”。这也是《呐喊》《彷徨》采用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文学手法的原因，因为现实主义于此凸显出了以形象的现实性、具体性来感染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效用。既然最根柢的“中国问题”是本根无我，针对性重构民族生命的途径当然是“朕归于我”。

在《呐喊》《彷徨》外在形象描摹民族生存人之非在诸相，内在揭示民族生命本体缺失的基础上，由“五四”呐喊而入彷徨于无地的鲁迅于运交华盖之中更加痛切、更加焦灼地感到“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没有法”的他最终将潜隐在作品深处、借助作品人物说话的最本己之“我”凸浮而出，他要自身最本己的存在言说“我”的“全部人生哲学”，一种超越现实诸相、“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的终极性言说。他所言说的正是他自己据以行动的内在隐秘言语，其“朕归于我”的全部人生哲学就见之于作为此我的“野草”之在，这便是《野草》。

这样，“我”“野草”便成为象征性的生命符号，一种与庸众截然对立的人格样态的象征，示现出善美刚健的生命本体。相应地，文学创作的方法也由《呐喊》《彷徨》以现实主义为主转向《野草》以象征主义为主，因为象征主义所具有的暗示性艺术效用更易于表现难以言说的形而上质。因此，《野草》实则是以《呐喊》《彷徨》为基生命蓄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野草”式的此我之在所呈现的“鲁迅的全部人生哲学”实则是“朕归于我”的生命本体与人格样态如何成为实在的本体论与生存论，一种以最本己之“我”示现的方式对最根柢

“中国问题”的解答，并沿此标示出“惟此自性，即造物主”的终极归向。“自性”的澄明，以“野草”式人格样态对于“我”之“自性”的践履亲证，一方面凸显出鲁迅之为鲁迅的特质，另一方面凸显出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民族生命本体重构。因此，《野草》最本质的意义是鲁迅立足民族生命本体的根性观照与重构这一最根柢的“中国问题”，以“野草”式的此在之“我”为贯穿性生命符号向旱干沙漠般的社会示现“朕归于我”这一“立之为极”的人格样态。

相对于上述鲁迅以根脉所系的“鲁镇”这一中国主流文化中心区域生存方式的范本为基点来观照民族现实生存，沈从文则是以根脉所系的“湘西”这一“主流文化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区域生存方式的缩影”为基点来观照民族现实生存的。较之于鲁迅以时间性的纵向历史眼光立足“鲁镇世界”回溯整个民族生存史，沈从文则以空间性的横向历史眼光将这方相对封闭、保守的“湘西世界”与时代文明中心区域的都市世界进行相互参照，由此呈现出人类生活世界总体性现代转型中最根柢“中国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即在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这一“神之解体”时代，社会历史发展与人之存在表现出极度的二律背反，民族生命在“禁律”与“金钱”之下表现出极度的扭曲与沉沦，在“实际主义”中表现出浓厚动物性，无不显示出对于“自然”的违反，因本体“神性”的缺失，整个时代民族生命新陈代谢毫无意义。针对这一最根柢的“中国问题”，沈从文提出了“神在生命本体中”这一最基本、最核心的重构民族生命本体的哲学命题，并沿此标示出“生命具神性”的终极归向。“神性”的澄明，以

最本己之“我”对于“生命具神性”人格样态的践履亲证，同样显示出沈从文之为沈从文的特质与他独特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民族生命本体重构。

当“五四”所开启的重构民族生命的历史之维走过二十周年的时候，立身于以《边城》《长河》为代表的湘西系列创作的坚实人生基础上，正如鲁迅由《呐喊》《彷徨》而入《野草》，沈从文则由《边城》《长河》而入《烛虚》。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以最本己之“我”为贯穿性生命符号示现“立之为极”人格样态的《烛虚》等系列抽象创作实则为湘西题材系列创作这一坚实的金字塔基与塔身构筑了一个标示性的塔尖，是继“曲谱边城”之后进一步“独照虚空”的哲学提升，是“人性”向“神性”的进一步提升，那启明生命的金星“长庚”就闪耀于这金字塔的塔尖，鲜明标示出“生命具神性”的人生哲学取向。

上述鲁迅与沈从文分别以“自性”与“神性”为根本识别性的民族生命本体现代重构绝不是二人于历史转折处的权宜之计，而是二者立身当时的生存环境对最根柢的“中国问题”具有人之守望终极性与前瞻性的应对。“个人的发见”是“五四”开启的历史之维，沿此鲁迅以鲜明的现代个体生命意识对于民族心理奴性的抗拒仍不能说是“过去”，继续以“自性”为人生哲学取向建构尊严、独立、个性、自由的民族生命本体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因为要实现鲁迅所言的那种“人各有己”的“群之大觉”，马克思、恩格斯所取向的那种“人人各个有己”的“联合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神之解体到科学发展，我们在技术体系现代化构建上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沈从文所关注的那种“所得于物虽不

少，所得于己实不多”的情势却依然突出，“惟实惟利”“有形无形市侩化”的“实际主义”人性沉沦依然严峻。显然，人的生存并没有伴随着技术体系的高速现代化而一路欢歌。沈从文以恢复对自然倾心的本性为基点，以“神性”为人生哲学取向建构至圣至美的民族生命本体同样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因为要实现沈从文所希图的人性重返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所取向的“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我们同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鲁迅由《呐喊》《彷徨》而入《野草》，沈从文由《边城》《长河》而入《烛虚》，二人以对“朕归于我”与“神在生命本体中”的哲学命题的践履亲证向我们发出了超越时空的昭示。这种以最本己之“我”出场澄明“人”之性体的昭示正表明二人绝不是信条的营造者或教义的炮制者，他们呈献给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的是一种崭新而鲜活的精神与人格样态，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民族生命示现真正占有人的本质的根性，示现这种根性所引发的自我心灵运动，示现这种心灵运动所达至的生命极致状态。个体自由自律趋向于这种生命极致状态的过程就是人在形而下现实生存中对自我生命本体的形而上澄明，就是对“自性”与“神性”的真正占有，就是对“人”之本然之道的彻底回归，就是对生命的无限超越，而这正是二人之于民族生命现代重构这一最根柢“中国问题”的核心要义。

这部著作呈现的上述学术图景学理坚实、内涵丰富。尤为难得的是，研究者绵密的学术思维，一方面不沉湎于琐屑，显示出“史”的视野，彰显出广远之势，另一方面不流于空泛，着力于文本细读，发掘于精微之处。

麓山毓秀，精勤以求。在探求者相对稀少的中国现代文学

哲学维度上，相信这部颇具学力的著作会带给你别样的景致。

凌宇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引 论 民族生命本体的现代重构	001
-----------------	-----

第一章 “我”的存在即是“人”的拯救 ——《野草》与《烛虚》的标志性	009
--	-----

第一节 “自救”与“他救”	010
第二节 尖锐化的生存对立	032
※ “我”与“人”	044

第二章 朝向现代生存的践履亲证 ——《野草》与《烛虚》中的“我”	047
--	-----

第一节 “五四”与“我”	051
第二节 “我”的确证	088
第三节 燃烧自我的快慰	114
※ “我”	127

第三章 难见“真的人”	
——《野草》与《烛虚》中的“人”	130
<hr/>	
第一节 “奴才”与“阉寺性的人”	133
第二节 “看客”与“莫名其妙的人”	147
第三节 “聪明人”与“知识阶级”	164
※ “人”	181
第四章 在自身中看见神	
——《野草》与《烛虚》的生命哲学	184
<hr/>	
第一节 “奴隶时代的循环”与“神之解体”	187
第二节 “朕归于我”	215
第三节 神在生命本体中	257
第四节 “自性”与“神性”	298
※ 人之为人的应对	317
第五章 启人生之阖机	
——《野草》与《烛虚》的艺术形态	322
<hr/>	
第一节 地域色彩的消解	326
第二节 “坟”与“百合”	341
第三节 “独语”的现代性生命启蒙	373
※ “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	391
结 语 鲁迅、沈从文与“中国问题”	395

引 论 民族生命本体的现代重构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晚清王朝遭遇的危机不仅是一个国内事件，而且是一个国际事件^①，这意味着古典的“华夷秩序”逐渐被“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②。面对“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挟工业文明威势的“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③晚清王朝无法应付新的世界挑战，这直接危及中国在外部的世界主权关系中的自主，危及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自立。在这一历史转折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国际国内危机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经济事件、军事事件，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凸显出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事件、思想事件、精神事件。这便是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等文献中呈现的历史情势。

面对这一历史危机，如何将中国安放在新的国家体制、社会制度之上，如何将中华民族安放在新的价值体系之上，二者就像纸的正反面，形成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主线。这一历史进程被冯友兰、张岱年等学者称为中国社会历史的第二次大变动。^④

①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872.

② 冯天瑜. 文化守望[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6.

③ 这是李鸿章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所痛陈的中国面对的亘古未遇的严峻形势。（参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6）[M]. 北京：中华书局，1979：17；冯天瑜. 文化守望[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6-47.）

④ 冯友兰、张岱年等学者从时代视角归结出中国社会历史的三次大变动：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此次大变动是统一的奴隶制社会解体，社会产生大的激烈的震荡和斗争，然后，以秦汉帝国为标志，中国社会演化为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第二次是近现代，此次大变动是中国社会由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演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由中国人民百年的反抗和斗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标志，演进成独立的新的国家和社会，又经由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三次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核心，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入大的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变动的阶段和过程之中。第三次大变动早已开始，并仍在进行，仍在深入。（参见解洪祥.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这一社会历史大变动实质是一场彻底的更新，它一方面指向社会的需要，即建立一个科学的、民主的现代中国；另一方面指向人的需要，即建立人的具有现代品格的“内部之生活”^①。二者互为条件，但又各有侧重，前者侧重于现代的社会实体建设，后者侧重于现代的人的本体建设，同归于“中华民族新生”这一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的主题、主线。因此，“‘新生’诉求一直就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种种历史运动的隐性逻辑”^②，一种体现时代总精神的历史脉动。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华民族新生”这一历史逻辑的延伸中，我们往往将现代的社会实体建设与现代的人的本体建设这两个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基点简单地等同，或是混同。由于没有将“中华民族新生”外在的社会现实层面与内在的人的本体层面厘清，我们往往将社会现实层面人之存在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的变革简单地等同于人的本体精神结构的变革，即使在理论上有所认识，但是由于没有将其熔铸为人的本体意识，以至于不能真正从根本上理解、在现实行为中实践“人各有己”之于“群之大觉”的重要意义、人的本体建设之于社会实体建设的重要意义。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做出的论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马克思、恩格斯在做出这一论断时，将“联合体”作为这样一个社会的称呼，所凸显的正是“这样一个联合体”人人各个有己的内质。这样一个“联合体”的社会其各个个体与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诸行星与天空

①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强调：“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他的“立人”指向的正是“民族-个体”的“内部之生活”。“内部之生活强”实则是鲁迅“立人”的目标。本书从此处提炼出“内部之生活”作为民族生命重构的一个主要概念。

② 廖诗忠，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2。

③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之间的关系，“每个行星既有自转，但也服从于统一的公转”^①。事实上，“统一的公转”与“自转”各有其用。从鲁迅于其文学创作的起始处前瞻性地提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②到沈从文于其文学创作的尽头处回顾性地揭示“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让各种新的成就彼此促进和融和，形成国家更大的向前动力”^③的人类发展趋势，所鲜明显示的正是人的本体现代重构之于社会实体现代重建的本质性意义。

回顾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再也没有哪个历史阶段像上述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那样如此自觉地融入“中华民族新生”这一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进而又相应地在现实层面对于国家体制、社会制度与民族文化心灵、个体生命内质的现代重建有着如此直接的内应，有着如此全力的担当，有着如此强力的精神文化效应。尤为强调的是，文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极大地凸显出了重构民族文化心灵的功能，凸显出了重构人的“内部之生活”的功能，即民族生命本体的现代重构功能，这是晚清以降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国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在极为艰难的时势中担负着这一历史功能。“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实绩的部分证明了这一点。19世纪末甲午战后，外国近代文化大规模、系统传入中国，而从它大规模传入中国第一天起，就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文化运动，而是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服务的。^④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直到严复，“一切文化活动的目的，还在政治救亡”^⑤。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以‘新民’为直接目的

① [英] 培根. 人生论[M]. 何新,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78.

② 鲁迅. 鲁迅全集(8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6.

③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6卷)[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535.

④ 解洪祥.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84-85.

⑤ 解洪祥.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85.

的文化活动，和以改良政治为直接目的的政治活动有很大不同”，“在 1898—1903 年的短短几年中，由于梁启超的努力，近代理性主义的文化运动，事实上已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而且这个运动在近代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启发和培育了为数不少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①。但是，“梁启超所发动所进行的带有独立品格的文化运动很快为另一场政治运动——辛亥革命——所遮蔽、所淹没”^②。“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作为一场文化运动，是取得了独立的文化品格的”，其规模、其声响、其激烈程度、其历史影响，也远远地超过了梁启超所发动所进行的文化运动。^③但是，这场新文化运动很快融入新的社会运动。正是在这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情状之下，当我们再次审视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中的担当的时候，文学的两条脉络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二者虽二而一，但侧重却不相同：第一，侧重于重构民族文化心灵，重构人的“内部之生活”，以人的需要为尺度，以民族生命本体的现代重构为取向，以此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生存；第二，侧重于呼应政治运动，呼应革命斗争，以社会的需要为尺度，以社会实体的现代重建为取向，以此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与富强。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华民族要真正实现伟大复兴，仅仅有技术体系的现代化是不够的，必须有价值体系的现代性，而且后者必将制约前者。当我们站在这一时代制高点的时候，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中的第一条脉络的重要性便浮现出来。

正如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诞生要有时代的运动，要有像地球大板块那样的历史、时代、文化冲撞一样，鲁迅与沈从文强烈感应的正是上述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的历史、时代、文化的诉求与冲撞以及文学在这一历史转折处对于民族生命本体现代重构的独特担当，鲜明指向的正是

① 解洪祥.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85.

② 解洪祥.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86.

③ 解洪祥.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86.

以个体生命内质的脱胎换骨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生。换句话说，鲁迅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是以“中华民族新生/民族生命重造”为终极母题的，承担着呼唤国人灵魂的历史使命，而这一文学创作终极母题与历史使命取向的“中华民族新生”是人的本体的现代重构，一种朝向现代生存、与传统人格有着结构性区别的新的民族生命本体精神结构，而非局限于社会现实层面人的社会关系变革与外部生存环境变革。这就是鲁迅所担承的“立人”“改造国民性”，沈从文所担承的“重造生命”“重造民族品德”。因此，在根本层面上，二人正是以对“中华民族新生”这一历史逻辑的自觉融入，内应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体制、社会制度寻求现代转型“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①以及中华民族寻求适应历史进化、社会发展以自强保种的历史诉求，内应建设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与“内部之生活”庄严深邃的“民族-个体”的社会诉求，重建与之相应的民族精神文化，重建与之相应的民族生命本体，重建与之相应的涵养民族文化心灵与人的“内部之生活”朝向现代生存的文学经典。二人文学创作对于上述历史之于文学、文学之于历史的独特情形的集中再现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一个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情形的宏观格局，即以“中华民族新生”这一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的历史逻辑来观照二人的文学创作，又同时以二人的文学创作来具体观照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中民族文化心灵与人的“内部之生活”的结构性重构。

正如我们站在民族文化心灵的立足点上才知道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倘若没有唐诗宋词、四大名著，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灵生活将是怎样的黯淡、我们民族生命的精神本体将是怎样的缺失一样，我们唯有回顾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中是如何重构民族文化心灵的，是如何重构人的“内部之生活”的，才知道鲁迅及其《阿Q正传》等一系列创作与沈从文及其《边城》等一系列创作之于民族文化心灵塑造、之于

^① 冯天瑜. 文化守望[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8.

民族生命本体现代重构的重要意义与独特存在。因此，倘若我们站在“中华民族新生”这一主题、主线与历史逻辑回顾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中人的“内部之生活”重构的内在动因、诉求与历程，鲁迅与沈从文便会以其所具有的独特精神创造力而呈现为这一历程中的标志性存在。这里所谓的标志性存在是指在“中华民族新生”这一历史逻辑中二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结构相对于其他精神文化结构所具有的特质。但是，现实的各种因素也许遮蔽、消解了这种对于民族文化心灵与人的“内部之生活”具有的指向性，需要我们以拨云见日的研究方式将其凸浮出来。

立足“中华民族新生/民族生命重造”这一文学创作主题，二人在文学创作的具体层面各有侧重：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中华民族中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中心区域的生存方式最集中、最深刻、最典型的显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则是“主流文化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区域生存方式的缩影”。^①二人在民族文化心灵与人的“内部之生活”重构上实则对立又统一，殊途又同归。相应地，当我们沿着“中华民族新生”这一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的主题、主线与内在逻辑，以鲁迅与沈从文为两个标点进行历时与共时回顾与展望的时候，晚清以来的民族文化心灵重构的历程及其状态便会得到较为完整而具体的呈现，这不仅便于在根本上凸显出鲁迅与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定位与内在价值，而且更有利于民族文化心灵重构穿过历史与现实的诸多迷雾向着更加切合“中华民族新生”这一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逻辑延伸。

帕斯卡尔说：“我们写一部著作时所发现的最后那件事，就是要懂得什么是必须置之于首位的东西。”^②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之于“中华民族新生”这一历史逻辑与现实诉求独特担当的时候，当我们重新审视鲁

^①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增订本)[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460.

^② [法] 帕斯卡尔. 思想录[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1.

迅与沈从文以“中华民族新生/民族生命重造”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之于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民族文化心灵重构的标志性存在的时候，一项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便在历史与现实的雾霭之中凸浮而出：鲁迅与沈从文所共构的精神文化结构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使民族生命本体现代重构在一个新的起点发生、发展的，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又具有怎样的价值。

任何工作都需要从具体的步骤入手，诚如卡西尔所说：“我们首先要找到一个正确的，能够引导我们对经验材料作出恰当合理解释的逻辑出发点。”^①凌宇先生在《从边城走向世界》这部新时期国内第一次系统科学研究沈从文的标志性著作里，于增补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烛照人生的抽象之域”中，为这项研究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个具体的步骤与“逻辑出发点”：

《烛虚》不仅是不折不扣的散文，而且是一部哲理化的散文诗。《烛虚》之于《湘西》《湘行散记》，犹如鲁迅的《野草》之于《朝花夕拾》。《烛虚》与《野草》不单具有相似的诗性特征，而且各各消解了《湘行散记》《湘西》和《朝花夕拾》中的地域色彩，所有的思考都指向对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烛虚》与《野草》，堪称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双璧。

这一论断从文学、文化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野草》与《烛虚》^③之间的可比较性，而且也指明了这一比较研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即二者在各自的历史语境中进行了怎样的民族生命重构。总体审视，“《野草》与《烛虚》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课题在凌宇先生提出之后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李化梅, 译.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9: 39.

②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增订本)[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398.

③ 沈从文《烛虚》所收文章分两辑。第一辑包括《烛虚》《潜渊》《长庚》《生命》诸篇。第二辑为一组有关文学运动与文学创作的论文。将《烛虚》作为散文集，是就第一辑诸篇而言的。以《烛虚》为标志，沈从文紧随其后于20世纪40年代又连续创作了《水云》《绿魇》《黑魇》《白魇》等，组成了沈从文充满人生哲理思辨的散文系列。本书同《野草》进行比较的就是以《烛虚》为标志的这一系列哲理思辨性散文。

还未见实质性的推进，^①其内在本有的宏阔研究空间、丰厚内容含量与深远研究价值还未得到实质性的系统发掘。特别是《野草》与《烛虚》在民族文化心灵与个体生命内质现代重构上所具有的价值，更未得到具体而充分的研究。

倘若我们将前文由“中华民族新生”这一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的历史逻辑、文学之于这一历史逻辑的独特担当而及鲁迅与沈从文自觉融入这一历史逻辑与独特担当的标志性存在这种由大到小的宏观思维格局倒过来，便会从凌宇先生的上述论断由小到大地引申出一系列微观而具体的思考：第一，《野草》与《烛虚》“各各消解了《湘行散记》、《湘西》和《朝花夕拾》中的地域色彩”，即舍弃“鲁镇”与“湘西”这一个性化的典型环境，这分明是二人创作异变的征候，那么，《野草》与《烛虚》之于鲁迅与沈从文具有怎样的标志性？第二，这种标志性显示出鲁迅与沈从文怎样独特的在世生存？第三，这种在世生存反照出民族生命怎样的缺失？第四，面对这种缺失，二人在历史转折处对于民族生存作出了怎样的应对？第五，这种应对标示出了怎样的哲学向度？因此，凌宇先生的上述论断实则为本书在“中华民族新生/民族生命重造”这一“自近代以来种种历史运动的隐性逻辑”上、在文学内应这一历史逻辑重构民族文化心灵的独特担当中探究鲁迅与沈从文的标志性存在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①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涉及这一比较研究的论文仅有一篇硕士论文——贺菲菲《〈烛虚〉与〈野草〉的比较研究——从自我认识及重造的层面探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该文主要集中于鲁迅、沈从文此期生存状态的比较，重在探析二者精神层面的相似性，分三章：第一章主要分析社会背景与两人的生存危机；第二章主要阐述两人对自我的开掘，即“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解剖，自我否定”，“自我重造，自我超越”；第三章主要探讨两人如何运用梦境或独特的意象展示自己的内心和思想。这一研究虽然关注到二者的相似性，并对生存体验的诸多症候作了一定的分析，但还停留于形下经验层面，还未能从形上终极层面把握二者的本质存在，更未涉及二者之于民族文化重建的意义，即二者之于民族生命现代重构的昭示性，在上述凌宇先生对于二者宏观论断的起点上还未做出实质性的推进。

第一章

「我」的存在即是「人」的拯救

——《野草》与《烛虚》的标志性

第一节 “自救”与“他救”

—

《野草》的本真形态到底是什么，它对于鲁迅具有怎样独特的内在意味？这是一个研究《野草》之于鲁迅生命世界的入题问题。从 1925 年 3 月 31 日章衣萍发表于《京报副刊》的《古庙杂谈（五）》这一《野草》最早见诸文字的反响起至今，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就一直未曾停止过。亚里士多德说：“若无提摩太，我们将不会有多少抒情诗；可是若无弗里尼，就不会有提摩太。这于真理也一样；我们从若干思想家承袭了某些观念，而这些观念的出现却又得依靠前一辈思想家。”同样，本书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学术史链上的。回顾近九十年的《野草》学史，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主要集中于三个维度：

第一，《野草》是“现实的”。1931 年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是这一社会历史维度研究最主要的元点，研究者以此为源深入探究“时代产生了《野草》”。鲁迅在该序中的自我表白重在强调《野草》的现实社会背景与写作动机，体现的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时代精神。这一社会历史维度研究虽已在 1925—1949 年这一研究时期就

① 张梦阳. 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5.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6.

③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这样自述《野草》的产生：“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鲁迅. 鲁迅全集（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5.）

已开始，但最集中、最突出的研究时期却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新时期之初，主要聚焦于《野草》本有的战斗精神，对于彷徨、苦闷、黑暗、虚无、绝望、死亡等生存体验与生命情绪只是附带性论及。这一社会历史维度研究《野草》的集大成者当属孙玉石，他的“标志着作为鲁迅学一个分支的《野草》学正式形成”的《〈野草〉研究》（1981年）以《〈野草〉英文译本序》中鲁迅表白的《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为研究基点，论述“时代产生了《野草》”。他的研究在“这一束永不凋谢的小花的主要思想光彩”上集中展示的是《野草》“赞颂韧性精神，严肃解剖自己，批判社会现实，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研究者对于上述社会历史维度研究的主要质疑是“过于坐实偶然性事件却是不可取的”，“《野草》最厚实的土壤是作者蓄之已久的精神世界”。

第二，《野草》是“哲学的”。1925年3月31日章衣萍发表于《京报副刊》的《古庙杂谈（五）》与1925年4月11日鲁迅给赵其文就《过客》询问的答复信是这一人生哲学维度研究最主要的元点，研究者以此

-
- ① 主要参考文献：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1年），卫俊秀的《鲁迅〈野草〉探索》（1954年），冯雪峰的《论〈野草〉》（1955年），吴小美的《论鲁迅〈野草〉的思想》（1963年），李何林的《鲁迅〈野草〉注解》（1973年）等。
 - ② 张梦阳. 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106.
 - ③ 孙玉石. 《野草》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 ④ 孙玉石. 《野草》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
 - ⑤ 王乾坤. 鲁迅的生命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303.
 - ⑥ 1925年3月31日在《京报副刊》上章衣萍谈了他对《野草》的认识：“由他去罢！”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一种对于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章衣萍. 古庙集[M]. 北京：北新书局，1929：18.）
 - ⑦ 1925年4月11日鲁迅给赵其文回信：《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斗争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实践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鲁迅. 鲁迅全集（1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7-478.）

为源深入探究“《野草》包含着鲁迅的全部人生哲学”。鲁迅自我表白的“反抗绝望”成为《野草》人生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点与指向。汪晖在《论〈野草〉的人生哲学》（1987年）的基础上写成代表作《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1年），其中表白：“我对《野草》的研究不是就具体篇章作现实性的还原，以说明这些文字在鲁迅生活中、在当时的现实状况中体现怎样的意义（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而是把《野草》当作一种思想性著作、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去阐释。”他以“反抗绝望”为基点，以“历史中间物”为视点，从存在意义上构筑鲁迅完整的人生哲学。这显然是对长期惯常的现实社会历史维度研究与单篇注解非体系化研究的一种反拨与实质性的突破。实际上，汪晖的自我表述与具体研究已显示出跨过形而下而直接进入形而上的研究意图。较之汪晖，王乾坤在这条路上的鲁迅生命哲学研究步子跨得更大。他以汪晖从鲁迅生命世界提炼的概念“中间物”为贯穿，集中研究鲁迅的生命哲学。他的《鲁迅的生命哲学》（1999年）正是以形而上“玄览”的方式完成的，《野草》当然是其“玄览”的重中之重。可以说，在20世纪之末汪晖、王乾坤等人将《野草》形而上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那么，《野草》的哲学维度研究是否就是对现实维度研究的超越呢？并不能这样一概而论，至少有研究者对于汪晖等人的研究提出质疑：“这还是现实的鲁迅吗？还是鲁迅的散文诗吗？不过一个完全存在主义化了的鲁迅，一个现代西方学者眼中的鲁迅罢了。”

-
- ① 该书后来经作者补充修订为《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本书采用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修订本。
 - ② 汪晖.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57.
 - ③ 吴康. 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04.

第三,《野草》是“情感的”(“心理的”)。1926年10月10日高长虹《走到出版界——写给〈彷徨〉》是这一情感(心理)维度研究最主要的元点,研究者以此为源深入探究《野草》“入于心的历史”。高长虹对于《野草》“一个明暗之间的彷徨者”“在较深刻的意义上人生怕是永远在明暗之间”的鲁迅形象界定成为《野草》情感或是心理研究的重要基点。这一情感(心理)维度研究最引人瞩目、最受争议的是以鲁迅爱情为切入点的新见与妄说并存的《野草》研究。李天明的《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2000年)试图破译藏匿在11篇散文诗中的鲁迅与许广平的私典。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2004年)把《野草》整体定性为爱情散文诗集。对此,有研究者以孙玉石的《〈野草〉研究》为参照提出尖锐质疑:“如果说李天明通过‘私典’解读文本还有一点西方文论的支持,那么胡尹强的解读就完全是大胆的臆测”,“整本书论证推理之牵强荒诞,结论之生硬乖谬,表明现代文学研究在某些研究者那里,是一个可以无尽发挥自己的主观意志、完全缺乏科学性的领域”。

上述三个维度研究的历史延伸表明,一方面《野草》在“现实的”“哲学的”与“情感的”(心理的)层面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含量,它的复杂性、多向性是事实存在;另一方面每一个维度的研究又同时受到其他维度研究的质疑,这说明片面的深刻也许遗漏的是研究对象的本真形态。片

-
- ① 高长虹最早对《野草》作出总体评价,试图走进《野草》隐蔽心灵世界。他在《走到出版界——写给〈彷徨〉》中为《野草》心灵世界的探索留下了一个有见地的小片断:我初次同鲁迅见面的时候,我正在老《狂飙》周刊上发表《幻想与做梦》,他在《语丝》上发表他的《野草》。他说:“幻想与做梦”光明多了!”但我以为《野草》是深刻,他说了他象他所译述的 Kuprin 的一篇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我没有看见那篇小说,但《野草》的第二篇《影的告别》便表现得很明白。虽然也可以说是年龄的关系吧,但我以为时代或者是较真实的原因呢。在去年的一年间,鲁迅显然是一个战士了,彷徨的分子似乎已减少,而光明加多了,虽然在较深刻的意义上人生怕是永远在明暗之间吧!(高长虹. 高长虹文集(中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13.)
- ② 刘继业. 论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J]. 鲁迅研究月刊. 2007(8).

面地凸显一个维度固然不见《野草》的本来面目，是不是将三者相加就是《野草》的本来面目呢？事实上，简单的叠加仍然不是《野草》的本来面目，因为森林并不是树木的拼合。《野草》显然不是一般性的社会历史批判，也不是概念演绎的知性形而上哲学，更不是个人园地里自怨自艾的记录。以上三个维度研究互相之间的质疑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么，该以何种方式才能把握《野草》的本真形态与独特的内在意味，进而由此呈现出《野草》之于鲁迅乃至于民族生命重构的标志性呢？我的方式是最彻底地回到《野草》本身，回到鲁迅本身。事实上，《野草》正存在着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元点。

整体审视《野草》，最具元点性、贯穿性的生命符号当是“我”。《野草》24篇（包括题辞与23篇正文）有17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只有7篇是第三人称，更为重要、鲜明的标志性是所有的篇目在内容上都显示出鲁迅最本己之“我”的出场。鲁迅说《野草》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确证《野草》之“我”的这种本己性。也就是说，不管是社会历史维度、人生哲学维度还是情感与心理维度都聚合于“我”最本己的在世生存之中，以“我”之存在为发酵。第一篇《秋夜》展现出“我”当下生存的环境——繁霜可怖的“夜”。“我”在这样的夜晚开始入梦。第二篇《影的告别》开始讲述“影”在“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说出的那些告别的话。其后，“我”继续行走在昏沉的夜梦中，经历了一系列“我梦见自己在……”的“梦魇”。最后一篇《一觉》“我”在“看见很长的梦”之后“惊觉”，作出了一段具有回顾性的自述：

野薊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我记得托尔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动，因此写出一篇小说来。但是，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拼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渴的旅人，

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我以为，这段自述集中道出了《野草》以“我”的最本己出场所呈现的鲁迅在世生存的独特生命意味。“野薷”（野草）是“我”的自喻，“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意味着“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还要开一朵花”展示出“我”坚韧的生存意志与顽强的生命力。“我”像野草一样在生命遭受“几乎致命的摧折”的危急时刻，“在早干的沙漠中间”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拼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这“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即“自救”。然而，“造成碧绿的林莽”却“使疲劳枯竭的旅人，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即实现“他救”。这是怎样的一种呕心沥血的“他救”啊！所以想来“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鲁迅在结尾处连续加了“！”与“？”两个标点符号正是为了强调这种“自救”与“他救”的独特：“！”突出它的悲壮可感，“？”突出它的发人深思。因此，我以为《野草》实则是“我”在生命危急的时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所进行的一场悲壮的“自救”与“他救”。

事实上，1940年代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视鲁迅为精神导师的冯至在他的《十四行集》中专门为《野草·一觉》写下了这样一首感谢的、可视为鲁迅画像的十四行诗：

在许多年前的一个黄昏，
 你为几个青年感到“一觉”；
 你不知经验过多少幻灭，
 但是那“一觉”却永不消沉。

① 鲁迅. 鲁迅全集（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9.

我永久怀着感谢的深情，
望着你，为了我们的时代：
它被些愚蠢的人们毁坏，
可是它的维护人却一生

被摒弃在这个世界以外——
你有几回望出一线光明，
转过头来又有乌云遮盖。

你走完了你艰险的行程，
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
曾经引出你希望的微笑。

这首“应该看做是整整一代青年发自肺腑的永恒的心声”的十四行诗可以旁证我的上述关于《野草》的论断。这“一觉”“你不知经验过多少幻灭”正表明鲁迅危急的生存情势，“但是那‘一觉’却永不消沉”再现出鲁迅在此危急情势中的坚韧“自救”，而这种“永不消沉”的“自救”却是“为了我们的时代”的“他救”，然而这个“维护人”却一生“被摒弃在这个世界以外”，这不正是鲁迅遭遇的“野草式”生存悖论吗？正是在这种生存悖论里，这场“自救”与“他救”才会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鲁迅在“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拼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竭的旅人，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种“自救”与“他救”之中，以“自然是”与“然而”进行语义的连接与转换。如果将其简化一下就出现这样一种关系：这自然是“自救”，然而却

① 孙玉石. 《野草》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60.

是“他救”。这样，《野草》就呈示出了多层复合的生存与生命形态：第一，以“自然是”强调《野草》首先是以“自救”的形态存在的；第二，以“然而”强调《野草》也同时是以“他救”的形态存在的；第三，以“自然是”……“然而”的贯通强调《野草》的“他救”前提是“拼命”的“自救”，“他救”是被动的，“自救”是主体性的；第四，以“自然是”……“然而”的贯通同时强调《野草》的“自救”本身就是“他救”，二者是互体的，相应地，“我”与“人”的关系就呈示为：“我”的存在即是“人”的拯救。

二

相对于《野草》篇目一经发表就引起反响，相对于《野草》几乎从未中断的近九十年研究史，相对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的文学史里就单部作品而言唯有“《野草》学”形成近似《红楼梦》研究那种“红学”的学术格局，沈从文《烛虚》的研究是寂寞的。其实，早在1946年沈从文在《从现实学习》中就自明以《烛虚》为标志的昆明时期文学创作的全面转型不被世见容的命运。对于这种创作被一般人认为抽象隐晦且与现实脱节，他以“从现实学习”为题进行自述就鲜明表露出对此答辩的意图，正如题记所言：

——近年来常有人说我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试梳理个人游离于杨墨以外种种，写一个小文章，用作

对于一切陌生访问和通信所寄托的责备与希望的回答。

沈从文反复强调他“所明白的现实”和“一般人所谓现实”是不一样的，因此“追求抽象方式”也“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以至于被看作是“不懂‘现实’，追求‘抽象’”，“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一自述本身透露出以《烛虚》为标志的创作之于沈从文的独特生命意味。真正领略这一独特生命意味并首先将《烛虚》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研究者是沈从文的忘年交凌宇，他在《从边城走向世界》的增订版（2006年）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以“烛照人生的抽象之域”为题专节论述《烛虚》。他的研究凸显出《烛虚》抒情主人公孤独、睿思的人生探索者形象，在生存意义上沈从文“既无法在过去空间中找寻到心灵栖息之所，也无法在现实城市中找到一个可靠的价值立足点”，正是“在主体无法确证自身的行为中，充斥着主体强烈的焦虑感”，也就是说，“此时主体的焦虑感，已不仅仅是因现实人事的‘堕落’而生，更本质的则是由主体分裂而实现的，即陷入一系列对立要素的冲突中无法解脱”。正是在这种最本己的生存体验里，沈从文展开了人生的探索，试图依据生命法则在抽象之域构建至圣至美的生命世界，从而暴露出人类目前现实存在的虚妄本质，即“从现实存在角度看，目前人类的存在样式，是一种实在。那个想像、虚拟的生命的本真世界，是一种非在。然而，按照生命之理或生命法则，人类目前的现实存在，反倒是一种人的非在，而那个想像、虚拟的世界，反恰恰是一种人的实在”。也就是说，“《烛虚》的全部思考，虽然从民族生存现实出发，又回归民族的未来生存，但同时，其所思辨触及的战争与和平、生活与生命、真实与虚妄、生与死、美与爱、怕与羞诸多问题，又超越民族生存的

①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3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73.

②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增订本）[M]. 长沙：岳麓书社，2006：409.

③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增订本）[M]. 长沙：岳麓书社，2006：417-418.

④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增订本）[M]. 长沙：岳麓书社，2006：403-404.

时空而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以上研究表明,《烛虚》的立足点是沈从文最本己的在世生存。因此,首先将一切都回到沈从文最本己的存在那里正是本书研究《烛虚》的切入点。那么,《烛虚》所显示的沈从文最本己的存在是怎样的呢?

《烛虚》诸篇乃至其后与之相应的“魔字”系列与《水云》皆用的第一人称“我”,所有的篇目在内容上都显示出这个“我”是沈从文最本己的出场。正如《野草》一样,《烛虚》中“我”的现实生存情状、“人”的现实生存情状、民族生命的理想情状有机聚合于“我”最本己的存在。我以为,沈从文在《烛虚·烛虚(五)》中坦露出了这种最本己之“我”的独特存在:

可是目前问题呢,我仿佛正在从各种努力上将自己生命缩小,似乎必如此方能发现自己,得到自己,认识自己。“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

可是,这个我的存在,还为的是返照人。正因为一个人的青春是需要装饰的,如不能用智慧来装饰,就用愚騃也无妨。

“吾丧我”,“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表明“我”正面临着生存危机。为此,“我”必须“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破破碎碎”的“生命或灵魂”“粘合起来”,或是“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整合出“一个新生的我”,即“自救”。“可是,这个我的存在,还为的是返照人”,即“他救”。因此,《烛虚》也同样是沈从文在生命危急情形中所进行的一场悲壮的“自救”与“他救”。

黄苗子回忆自己在 1940 年代看到沈从文刚刚出版的《烛虚》时的情

①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增订本)[M]. 长沙:岳麓书社,2006:410.

②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12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7-28.

景可以旁证我的上述关于《烛虚》的论断：

四十年代开始，那时在多雾的山城——所谓抗战“陪都”，天天躲警报，天天听到“磨擦”消息，天天看物价飞涨，天天读德、日法西斯向全世界疯狂屠杀，读大隧道惨案、公务员贫不聊生全家自杀、“孔二小姐”奇闻、航空奖券发财逸话……之类的报纸新闻，使我感到空气窒息，有如在污浊的阴沟中受到六月炎暑的蒸郁，人在衙门公案上天天盖图章，心里却茫然惘然，不了解这生活和生命到底为了什么，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